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丛书主编 彭一刚 郑时龄

Sociable Cities: The 21st-Century Reinvention of the Garden City

Peter Hall , Colin Ward

社会城市：再造21世纪花园城市

[英]彼得·霍尔 [英]科林·沃德 著
吴家琦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丛书主编 彭一刚 郑时龄

**Sociable Cities:
The 21st-Century Reinvention of the Garden City**

Peter Hall , Colin Ward

社会城市：再造21世纪花园城市

[英]彼得·霍尔 [英]科林·沃德 著

吴家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城市：再造21世纪花园城市 / [英] 彼得·霍尔 (Peter Hall) [英] 科林·沃德 (Colin Ward) 著；吴家琦 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8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ISBN 978-7-5680-1926-2

I. ①社… II. ①彼… ②科… ③吴… III. ①居住区－城市规划－研究 IV. ①TU98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8500号

Copyright©2014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Sociable Cities: The 21st-Century Reinvention of the Garden City*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授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本书封面贴有Taylor & Francis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7-2016-283号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

社会城市：再造21世纪花园城市

SHEHUI CHENGSHI: ZAIZAO 21 SHIJI HUAYUAN CHENGSHI

[英] 彼得·霍尔 [英] 科林·沃德 著
吴家琦 译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地 址：武汉市珞喻路1037号（邮编：430074）
出 版 人：阮海洪

丛书策划：姜新祺
丛书统筹：刘锦东
策划编辑：张淑梅

责任编辑：王丽丽
版式设计：赵 娜
责任监印：秦 英

印 刷：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996 mm 1/16
印 张：15
字 数：359千字
版 次：2016年8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78.00 元

投稿邮箱：zhangsm@hustp.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世界城镇化建设理论与技术译丛》编委会

主 编：彭一刚 郑时龄

编 委：段 进 华 晨 黄亚平 李保峰

李振宇 刘克成 毛其智 宋 昆

孙一民 张京祥 张 明 赵万民

(以姓氏拼音为序)

作者简介 | About the Author

彼得·霍尔（Peter Hall, 1932—2014）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当代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大师，被誉为“世界级城市规划大师”。他曾任英国著名的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教授、英国城乡规划协会及地区研究协会主席，以及为英国环境国务大臣提供策略性规划之特别顾问、副首相之城市专责小组组员。他长期从事城市区域规划、交通和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教学和科研，著有50多本论著，且其著作影响广泛深远。

科林·沃德（Colin Ward, 1924—2010）

英国社会和环境事务评论家、博士、著名自由作家，著有30多本书，包括建筑、城市规划、自建住宅和自留地等方面的论著。

前 言 | Preface

埃比尼泽·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 的著作《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 出版于 1898 年 10 月。8 个月之后，霍华德于 1899 年 6 月成立了花园城市协会 (Garden City Association)，来为这本书中的各种思想做宣传。这本书的初版只卖出几百本，1902 年再版时改名为《明日的花园城市》，而它将注定成为 20 世纪城市规划史上最有影响力和最重要的著作：在接下来的 70 年里，它实际促成了莱奇沃思 (Letchworth) 和韦林 (Welwyn) 两地的花园城市草创实践，在这两个项目中，霍华德都亲自参与，在那之后——在他 1928 年去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就出现了 30 座新城，而在世界各地出现的仿制品就数不胜数了。

“花园城市协会”先是改名为“花园城市与城镇规划协会”(Garden Cities and Town Planning Association)，后又改为“城乡规划协会”(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ssociation)。本书英文版最初是为了纪念“城乡规划协会”成立一百周年而出版的，我们在这本书里试图理清三件事：第一，讲述霍华德发起这场运动最初一百年的发展历史；第二，探讨霍华德思想中某些最重要的内容是如何被颠覆及受到诋毁的；第三，试图阐述，在正在到来的 21 世纪里，我们在努力创造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社区的时候，霍华德的这些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6 年之后，这本书已经脱销，同时我们的世界及各个地方的规划实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区域战略性规划经历了兴盛和衰退周期，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进行详细点评；自从霍华德提出自己的梦想以来，今天的我们应该是距离实现这一梦想最遥远的一群人；社会民众对于这样的局面也存在着巨大的不满。今天，像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 (David Cameron) 这样的政界大人物（在 2012 年 3 月的一次讲话中）也曾经高度赞美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方案，认为它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条途径，他的内阁成员中有不少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在这里，我们并不需要借助任何法术（霍华德则很愿意借助于精神手段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就可以判断出，政府官员的这些谈话将带来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带来一个全新的国家政策纲领。因此，当编辑安·拉德金 (Ann Rudkin) 女士建议再出一个新的版本，把它与我的新书《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欧洲是怎样找回丢失的城市规划艺术的》(*Good Cities, Better Lives: How Europe Discovered the Lost Art of Urbanism*) 同时结伴出版的时候，我爽快地答应了。

但是，我们有一个无法逾越的困难：科林·沃德 (Colin Ward) 于 2010 年离开了我们，享年 85 岁，这让人很难过。我们也无法想象让其他人来替代他的独特风格。因此，我们很快就取得一致意见，由沃德撰写的那四章，除了个别的地方有必要进行简单更新之外，其余正文将保持原样不变。这四章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城乡规划协会曾经有过一个非常优秀的活动，内容包括阅读、诗歌和音乐。这项活动曾经在英国各地有大量的热情参与者，今天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它。

我觉得这项活动的名称就非常适合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因此我就用这个名称作为第二部分的标题。

在 1998 年，本书的部分内容早已在此之前发表过，如在城乡规划协会的刊物《城乡规划》（*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上；1996 年我在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所主办的登曼讲座（the Denman lecture）上（Hall, 1996a）；在由城乡规划协会与约瑟夫·朗特里（Joseph Rowntree）基金会联合进行的对住宅用地的一份调查报告《民众：他们将走到哪里去？》（*The People: Where will they Go?*）（Breheny and Hall, 1996b）中。我们非常感谢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及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是他们帮助我们研究了本书中的一些想法。新版中的某些内容也在过去 10 年间在《城乡规划》上发表过，也有些内容是我在 2006 年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韦伯讲座（the Melvin J. Webber Lecture）上曾经宣读过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玛格达·霍尔（Magda Hall），是她提醒我们要关注一下在加利福尼亚方兴未艾的农贸市场运动，这部分内容构成了本书第八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农贸市场运动后续的成功充分印证了科林·沃德的先见之明。沃德的这个想法与他的其他许多想法一样，后来都被采用。

正如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那样，如果没有安·拉德金女士的想象力和执着，这个全新的版本是根本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安·拉德金女士作为编辑和出版商与我合作 30 多年，她扮演了一位真正企业家的角色：发现一种需求，然后去满足这个需求。她在编辑我的另一本书《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欧洲是怎样找回丢失的城市规划艺术的》的时候，就在即将完成编辑工作之前，她注意到其中的许多想法和内容与我和沃德过去合作的那本书呈互补的关系，而后者则需要一些点评和修订。与以往一样，安·拉德金女士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是给车轮上点润滑油那样的工作，那是人们通常对编辑工作的期待，对她却并不适用。在这里我再次表达我无限的谢意。

彼得·霍尔

2014 年 3 月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部分 第一个世纪 / 1

- 第一章 霍华德的起点 / 3
- 第二章 花园城市：理想与现实 / 15
- 第三章 从花园城市到新城 / 34
- 第四章 跨越海峡的花园城市 / 54

第二部分 土地、生活、自由 / 71

- 第五章 自建住宅地块：一种未经规划的建造方式 / 73
- 第六章 乡野安置区：失败的替代方案 / 80
- 第七章 自己动手建造新城 / 88
- 第八章 不理睬邻避主义的干扰 / 96

第三部分 正在到来的世纪 / 109

- 第九章 过去和现在 / 111
- 第十章 追寻发展的可持续性 / 135
- 第十一章 明天的可持续社会城市 / 171
- 第十二章 努力把它变为现实 / 204

参考文献 / 226

译后记 / 231

《第一部分

第一个世纪》

我们在这里讲述的这个奇异故事，是出版发行于 19 世纪末、由一个卑微的作者所写的一本卑微的书如何改变了我们对城市的认识方式，并且改变了我们规划这些城市的方式。埃比尼泽·霍华德——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送给他一个不朽的名字“花园城市怪杰”（Garden City Geezer）——提出一个信条：大城市和乡村带给我们许多与众不同的东西，有好有坏，但是，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地方，即城市 - 乡村，它把城市和乡村中最好的东西结合到一起，并把随之而来的邪恶的东西摒除在外。他的花园城市是一个位于广袤乡村田野里的小镇，那里的居住和工作被紧密地布置在一起。这样的花园城市具体地宣示了霍华德的信条。但是，这样一座花园城市在取得成功的时候，它的庆祝方式并不是无限制地扩展，而是建造出第二座、第三座花园城市，等等，因此便产生出一组这样的花园城市，彼此紧密地互相连接在一起。这样由一组花园城市所组成的形态就是一座社会城市。

霍华德从来都是一个注重把乌托邦思想纳入社会实践的人。他最初成立了一个协会组织来宣传普及自己的观念和看法，随后又成立了一家公司，建成了第一座花园城市。城乡规划协会历经了 115 年的历史之后仍然枝繁叶茂，而莱奇沃思花园城市在它 111 岁生日的时候依然充满活力。这些都来自他本人的构想，并且注入大量心血才变为现实——正如韦林花园城市那样，霍华德于 1920 年在一次拍卖会上几乎倾家荡产买下一块土地来建造这座花园城市。但是，他的一座更大的纪念碑是他去世后 18 年所建造的那 28 座英国新城——这也许是世界上所有地方有计划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城市建设工作。在欧洲大陆上出现的不计其数的模仿花园城市的规划，也是他的纪念碑——只不过这些模仿的城市都演变成了某种奇怪的变种：花园郊区，亦即卫星城。

第一章 霍华德的起点

当埃比尼泽·霍华德于 1898 年 10 月出版《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的时候，他是一个 48 岁默默无闻的速记员，是一个装出有着体面阔气生活的穷人，妻子焦虑烦忧，他们和 4 个孩子住在伦敦北部的一间小房子里。为了出版这本书，埃比尼泽·霍华德不得不向一位名叫乔治·迪克曼（George Dickman）的人借贷 50 英镑。乔治·迪克曼是一位美国人，他是柯达摄影器材公司在英国的运营主管，同时他还是通灵术的痴迷信徒（在霍华德妻子于 1904 年去世以后的若干年里，他借助所谓的降神术 [séances] 与她进行了交流）。很有可能，霍华德自己买下了这一批书中的很大一部分来分送给朋友。但是，这本书对于出版商斯旺·索南夏因（Swan Sonnenschein）出版社来说，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决定再出版一批简装本，每本 1 个先令；到了 1900 年初的时候，两个版本一共销售了 3000 多册（Fishman, 1977, p.54, 转引自霍华德未完成的自传草稿；Beevers, 1988, pp.43、57、104）。

这样的起点不算高。但是，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霍华德的这本书于 1902 年以《明日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再次发行，这次在知识界却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冲击波，其反响遍及全世界：第一座花园城市于 1903 年在哈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莱奇沃思市启动建设；德国的几座花园城市已经在设计中，很快也将付诸实施；他的这本书也出现了多个外文版本。在这本书第一版出版后的半个世纪，也就是它的作者去世后 20 年，这本不起眼的书催生通过了一项国家级议会法案（Act of Parliament），并且在全英国范围内确立了一系列的新城建设项目。在第一版出版一个世纪以后，城乡规划协会支持再次出版发行了它的完整原版，配上精美的彩色插图——这些插图在第二版及后来的版本中都没有再出现——同时在每一页的对开页上再配上由彼得·霍尔（Peter Hall）、丹尼斯·哈迪（Dennis Hardy）、科林·沃德编撰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详细注释（Howard, 2003 [1898]）。历史上很少有哪一本书具有如此不同寻常的影响力。

霍华德其人

尽管如此，在 1898 年的时候，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仍然看不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事件。除了霍华德本人之外，估计没有什么人会觉得这本书会在日后成为只手改变世界进程的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之一。而且在各个方面，霍华德都不具备那种个性，也就是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被人们称为媒体宠儿的那种性格；他的身材也不是很上相的那种。他的一位忠实助理和追随者弗雷迪利克·奥斯本（Frederic J. Osborn）这样描述他：

对于一个早已闻其大名并熟悉其成就的陌生人来说，霍华德的个性会不断地让他感到惊讶不已。他是一个最温和、最没有架子的人，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很少有什么张扬的举动



图 1.1 埃比尼泽·霍华德。这位伟大的人物总是一副很谦卑的样子——难道这让人感到很惊讶吗？——他的演讲也总像布道家的颂词一样具有感人的力量。

(图片来源：城乡规划协会)

来彰显自己内心的强大。他中等个头，身体健壮，总是不修边幅地穿着一身非常普通的服装，属于很容易混在人群中而不被注意到的那种；萧伯纳先生非常钦佩霍华德所取得的成就，他在描述霍华德本人的时候，会把事实夸大了来说。他说这位“令人称奇的人”看起来就是一位“年迈的无名老头而已”，“股票交易所可能会把他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怪人而把他赶出去”。

(Osborn, 1946, pp.22-23)

《每日邮报》(*Daily Mail*) 的创办人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 (Alfred Harmsworth) 的弟弟塞西尔·哈姆斯沃思 (Cecil Harmsworth) 与霍华德非常熟悉。他把霍华德描述成“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他在我门中间一点架子都没有” (Thomas, 1983, p.1) 。哈福德郡当地的一位经纪人在为准备建造第一座花园城市而进行的土地交易中与霍华德于莱奇沃思市相识。他在描述霍华德的时候似乎没有那么友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一双具有看穿别人能力的眼中，他看起来连一个先令都不值” (Beevers, 1988, p.86) 。但是，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他具有控制讲台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是在今天，他就非常有可能具备一种控制电视演播厅的能力 (图 1.1)：

他最为突出的身体特征就是他那清晰鲜活的面部表情，他那精致的鹰钩一样的面部轮廓线，以及他那非常动听、有力的声音。因此，当你听说他年轻时曾经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莎士比亚话剧的业余演员的时候，你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奇的了。 (Osborn, 1946, p.23)

伦敦城市教堂 (City Temple) 的约瑟夫·帕克 (Joseph Parker) 博士曾经对霍华德说，他非常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布道者。尽管他在公众面前可以控制讲台，但是在私下里及商务活动中，他却是被忽略的人，其中部分原因是他过于关注自己的想法，不大在意行政管理方面的细节；这也是他能够集中自己注意力的结果。但是，每个人都喜欢他，尤其是孩子们 (Osborn, 1946, p.23)。

直到这时，霍华德的人生还是饱受折磨的艰难经历，可以说是失败的个人经历。他于 1850 年 1 月 29 日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图 1.2），父母都是做买卖的商人，他的青少年时代在英格兰南部的几个小县城里度过，这几个小县城分别是萨德伯里（Sudbury）、伊普斯威奇（Ipswich）、切森特（Cheshunt）——这一经历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如此热爱乡村。在 15 岁的时候，他不再上学，在城里找到一份雇员的工作。在 21 岁的时候，他移民去了美国，在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成为一名开垦荒地的拓荒农民。这段经历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失败。一年以后他来到芝加哥成为一名速记员，并终身从事这项工作。

他在芝加哥生活了 4 年，从 1872 年到 1876 年，而这段时间一定是他逐渐变得成熟并形成自己思想体系的时期。霍华德总是不承认自己是在这座“风城”^{*}找到灵感的，但是，后来所有研究他生平经历的人都一致认为，他的花园城市核心思想一定是在这里形成的，就在他住在密歇根大道（Michigan Avenue）的那段时间里；芝加哥这座城市在 1871 年那场大火之前就一直被人们那样称呼，但是在后来重建过程中很快就失去了这一特点。他也一定熟悉位于德斯普兰斯河（Des Plaines River）河畔的河边花园郊区，它距离芝加哥市区 9 英里（14.5 千米），由伟大的景观建筑师弗雷迪利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规划设计（Osborn, 1950, pp.226-227; Stern, 1986, pp.133-134; Beevers, 1988, p.7）。

后来，在 1876 年的时候，霍华德返回伦敦。他在格尼斯公司¹找到一份差事。这是一家负责报道议会新闻的官方通信社。他曾尝试与人合伙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就又回到格尼斯上班，后来也在其他类似的机构就业，直到去世：“他的一生总是在辛苦地工作，收入却很微薄”（Osborn, 1946, p.19）。但是，这份职业有一个优势，而他本人对于这个优势也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他曾经说他就是在职业生涯中为他的著作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的职业让他能够接触到当时社会上关于主要议题的各种论点（Beevers, 1988, p.7）。他还有许多爱好，而且都是达到痴迷着魔的程度，其中之一就是：他认定自己是一个发明家，而当他对某一个想法痴迷时，他会无视来自朋友的任何劝告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Osborn, 1946, p.19）。他把花园城市当作是自己的一项发明，正如他过去曾试图改进打字机使之能够具有不同字距和行距的选择一样，当然这次尝试没有取得任何结果（Beevers,



图 1.2 埃比尼泽·霍华德牌匾。位于霍华德的出生地伦敦巴比肯；但是，他的思想成熟于芝加哥及美国的大草原地区。

* 风城，美国芝加哥市的别称。——译者

¹ 格尼斯公司成立于 1735 年，一直从事议会及其他机构的报道速记，公司现在的名称是格尼父子公司（W.B.Gurney & Sons LLP）。

1988, p.12)。对于了解他的性格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线索：奥斯本对霍华德非常了解，他说，“允许我强调一点，霍华德不是一个政治理论家，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发明家”，是一个在思考出某个想法之后便动手通过设计图纸把自己的想法考虑清楚的人 (Osborn, 1946, p.21)。

动乱中的城市：霍华德的思想教育

对于 30 岁的霍华德来说，伦敦不仅仅是一个拼命做速记员谋生、梦想发明新式打字机的地方。这是因为在 19 世纪 70 年代过渡到 80 年代的时候，伦敦这座城市正处于社会和思想的大动荡之中。

整座城市是各种激进活动和“各种伟大事业”的发源地 (Hardy, 1991a, p.30)。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与海因德曼 (H.M. Hyndman) 分道扬镳后，为社会主义者联盟 (Socialist League) 创办了《公益》(Commonweal) 杂志；在流亡的俄罗斯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 (Prince Peter Kropotkin) 的赞助下，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了《自由》(Freedom) 杂志；另一份名为《今天》(To-Day) 的杂志在亨利·钱皮恩 (Henry Champion) 与休伯特·布兰德 (Hubert Bland) 的经营下也在社会上流行起来 (MacKenzie and MacKenzie, 1977, pp.76-77)。这些社会团体的每一位成员都想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人们是应该像海因德曼那样走上街头呢，还是像莫里斯那样在纸上画画？是建立无政府主义的公社呢，还是建立生产合作化并具有自我改进机能的理想主义的新生活协会 (Fellowship of the New Life) 呢？ (MacKenzie and MacKenzie, 1977, p.77)

这里的新生活协会是一位到处游荡的畅想家，托马斯·戴维森 (Thomas Davidson)，与爱德华·皮斯 (Edward Pease) 和珀西瓦尔·查布 (Percival Chubb) 三人于 1883 年共同建立的。从本质上讲，这是尝试着在地球上建立并且过上天堂般生活的一群人，用今天地上的天堂来取代天国的天堂。概括地说，他们在 1883 年 10 月 24 日举办的第一次会议，是费边社 (Fabian Society) 实践的发端 (同上, pp.15、22-24)。

又过了 10 年，到 1893 年的时候，布鲁斯·华莱士 (J. Bruce Wallace) ——后来的花园城市协会的创办人之一——成立了兄弟教会 (Brotherhood Church)，而这个教会组织的分会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无数追求各种理性和伟大事业的人们：

各类“怪人”都汇集到这里，大家走上开放的讲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里的讲台在每个周日的下午对外开放。无神论者、迷信招魂术的人、个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普通的政客、素食主义者、反对活体解剖的人、反对接种疫苗的人——总之，各式各样的“反对派”在这里都受到欢迎，也都有人听他们的演讲，同时也必须在随后的讨论中接受猛烈的批评。 (Hardy, 1991a, p.30, 转引自 Hardy, 1979, p.177 内莉·肖 [Nellie Shaw] 的话)

在 1879 年即将结束的时候，霍华德加入了一个辩论团体，名叫求证学会（Zetetical Society）。这个学会组织主要吸引了那些自由思考的人，其中包括了萧伯纳、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等人。霍华德与这些人很快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据奥斯本证实，霍华德阅读非常广泛；他在自己的著作里曾经引用过超过 30 人的言论观点，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到德比郡（Derbyshire）的一位主管卫生事务的官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大量地阅读发表在报纸上的各种报道、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在《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上的有分量的文章、费边社的文章，以及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文章。斯宾塞是他当初在芝加哥时认识的朋友，也许是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霍华德也循惯例常常参加非国教的礼拜堂活动，但是这时的他对礼拜堂的信仰早已不复存在；他的这种阅读习惯源于一种惯常的叛逆行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Beevers, 1988, pp.13-14、19、23），“促使霍华德产生花园城市这个概念的各种思想，主要来自于那些成长于或者沉浸在这种传统中的持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来自于托马斯·斯彭斯（Thomas Spence），而且也来自于理查森（Richardson）、斯宾塞，甚至来自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Beevers, 1988, p.24）。除了克鲁泡特金之外，霍华德似乎没有接触过其他任何来自于欧洲大陆的思想家的思想，甚至不知道马克思的思想（Beevers, 1988, p.24）。

19 世纪 80 年代的大辩论：土地问题

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霍华德开始重点关注土地问题。这毫不奇怪，因为当时引起全社会激烈辩论的两三个话题之一就是土地问题。基本的原因是当时的英国农业正处于严重的结构性危机之中。农业收成非常不好，同时随着美洲和澳洲新开垦出来大片的土地，来自海外的竞争更加激烈，这场农业大萧条恰好又遇上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谷物种植面积的减少，从 1879 年到 1900 年谷物种植面积减少了 1/4。农田租金减少了 50%；1885 年的时候，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说，假如当时有任何实质性的需求，那么第二天英格兰的土地中有一半便会被拿到市场上出售；甚至到了 1902 年，在哈福德郡，据估计仍有高达 20% 的农田处于闲置状态（Fishman, 1977, p.62）。

不仅如此，发生在爱尔兰的“土地战争”也给英国政治带来了巨大的杀伤力，这次发生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冲击仅次于爱尔兰自治（Irish Home Rule）所带来的冲击；此外还有亨利·乔治于 1881 年出版的一本书，《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这本书共卖出 10 万册（Douglas, 1976, pp.44-45）。成立于 1883 年的英国土地复兴联盟（English Land Restoration League）很快就成为鼓吹推广亨利·乔治思想的工具，主张“把税收的征缴完全转移到土地价值上面来，不要去管它的使用性质及后续的改造，并且最终做到全部土地税都是为了公共目的”（Douglas, 1976, p.47，转引自 *The Christian Socialist*, July 1884, p.23）。土地的单一税收主张从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期得到普遍支持，在 1888 年的时候又得到刚刚问世并且获得巨大成功的伦敦晚报——《星报》（*The Star*）

的大力拥护。在 1889 年初，第一次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简称 LCC）选举当中，根据土地价值进行征税的主张成为非常普遍的声音，尽管在议院代表选举时伦敦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选区，但是这次还是把几位持激进观点的候选人送进了议会（Douglas, 1976, p.113）。土地税在工人阶级群体组织里得到积极热烈的追捧。正如西德尼·韦布和比阿特丽斯·韦布（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指出的那样，它“彻底地”让 19 世纪 90 年代都会工人的态度“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不再是宪章派的‘回到田间’之类的呼声……城里的手工业者正在思考如何讨回还没有实际拿到手的城市土地价值增值部分，而目前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增值都进入那些大地主的保险箱里”（同上，p.117，转引自 S. and B. Webb, 1920, p.376）。伦敦郡议会在 1894 年开始急于进行土地价值评估，随后有很多其他政府权力机构跟进，但是，在 1901 年，负责地方税务的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则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Douglas, 1976, pp.118-119）。

有些人最初是坚持乔治派传统的，后来却转入了社会主义思想。土地国有化协会（Land Nationalisation Society）在 1881 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多年来，他们印制了许多宣传小册子，而这些小册子的内容则覆盖了一个跨度巨大的意识形态范围，从强制性收购到逐步国有化，把全部的土地归为公众所有，这个观点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的。它背后的推动力量来自于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他对于土地改革的兴趣因为 1879 年至 1880 年的那场爱尔兰土地辩论而得到强化。他和其他具有相同思想的人相信，乡村里有着大量的土地供应，仅此一项就足以吸引人们大规模地回到田间。他和霍华德非常熟悉，土地国有化协会为 1899 年的花园城市协会启动工作提供了核心的创始会员，并为 1900 年全国住房改革委员会（National Housing Reform Council）的成立提供了支持，在这两次组织筹建工作中，土地国有化协会均发挥了关键的作用（Douglas, 1976, pp.45-46、48; Hardy, 1991a, p.30; Aalen, 1992, pp.45-47）。

在整个 19 世纪 80 年代，土地问题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关注。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是第一位提出土地改革的重要人物。尽管他的许多想法并不是非常清晰，但是他从 1883 年到 1885 年在《双周评论》连续发表过许多文章，后来汇集成册，以《激进的纲领》（The Radical Programme）为名称再次发表，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三亩地一头牛”（Douglas, 1976, pp.48-49）。这场运动在凯尔特族的边缘地带引起的反响最为强烈，而这个区域跨越了整个爱尔兰和苏格兰；在英格兰听到的仅仅是一些微弱的回声，因为这里的农场工人似乎更倾向于用自己的脚来投票，他们要么搬到城里，要么搬到海外殖民地去。然而，张伯伦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留在英格兰的这些人到了城里就是拥挤在市区贫民窟了。尤其是在出现人口大迁徙的情况下，人口从英国内陆地带的农业区域——东英吉利（East Anglia），以及靠近伦敦中央区域的那些郡县——涌入高速膨胀的首都城区，加上住宅建筑又不停地改造成办公楼和火车站，导致很多人不得不滞留在城中心区的贫民窟里面（Douglas, 1976, pp.72、105-106; Beevers, 1988, pp.9-10）。自由派在 1885 年的选举中取得成功，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张伯伦的“三

“亩地一头牛”主张对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农业工人的吸引力。这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但是，用亨利·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ère）的话来说，自由派缺少“一头城市里的牛”（Douglas, 1976, p.53），因为这些自由派人士对于19世纪80年代在伦敦市区辩论中所涉及的那些类似的焦点问题，诸如首都城区的住房、居住条件等问题，根本给不出答案（Osborn, 1950, pp.228-229）。

在今天，人们很难理解土地问题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会引发人们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从根本上讲，它代表了两个阶层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一方面是旧有的拥有土地的阶级，他们是工业时代初期的既得利益群体；另一方面是新兴利益群体，他们力图破除土地财产拥有者对社会生活的影响（Thompson, 1965, pp.23-24）。而对于这一矛盾提出的调和方案又常常基于错误的理解，一般由城里人提出，而他们对乡村的具体情况又不甚了解，但是，这还不是关键点，“正如宗教教义的真理性与不断增多的改革运动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一样，只要这些激进的土地政策的真理性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对信奉这些政策的人仍充满着号召力，那么这些政策的真理性与反对土地拥有者的斗争也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Thompson, 1965, p.24）。

霍华德完全沉浸在这场大辩论运动中；在对问题的解读中，他试图提出自己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赫伯特·斯宾塞那里，霍华德引申出一条“最根本的大原则”，这个大原则就是：每个人对于地球的使用拥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Beevers, 1988, p.20）。但是，他并不知道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他在一位名不见经传、行为举止有些怪异的激进分子托马斯·斯彭斯那里找到了办法。斯彭斯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他在一次演讲中展示过，并于1775年11月在纽卡斯尔举行的哲学学会上宣读过它的内容。这本小册子在1882年的时候由社会民主基金会（Social Democratic Foundation）创始人海因德曼重新发行，同时加上自己的注释和评论，取名为《1775年和1882年的土地国有化》（*The Nationalisation of the Land in 1775 and 1882*）。霍华德一定是在这时阅读过这篇文章的。斯彭斯在文中宣称“因此，最早一批地主根本就是一群强盗和暴君”，他们的继承者也是一样的组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区县必须成为一个如同股份制公司那样的组织，然后凭借集体的力量来讨回自己丧失的权利；因此，地租必须交给集体，将来在使用时也必须用于公共目的，例如建造及维修住房和道路。不仅如此，地租很快就会产生盈余，我们把它分给运气不是很好的那些人，同时也用于社会改善方面的事业，例如学校和公共图书馆，霍华德的规划设计里就包括了这些内容。在斯彭斯设想的“斯宾索尼亚社会”（Spensonia）里，每一个社区都通过一个董事会进行管理，董事都由全体利益相关人员选举产生；花园城市的组织结构也是如此（Beevers, 1988, pp.21-23）。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斯彭斯根本没有说明人们是怎样来分得土地份额的。对于这个问题，霍华德倾向于通过有计划的迁移来完成新的殖民计划，这个想法大概是霍华德在1880年前后从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学来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所谓的有计划的殖民地建设，基本上是沿袭了40多年前由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所提出的主张，它的形态是结合了城镇和乡村特征的混合体。无论怎样，对于失